

朱杰人 严文儒 主编

《朱子全书》与 朱子学

——200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杰人 严文儒 主编

《朱子全书》

与朱子学

——2003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全书》与朱子学 2003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朱杰人 严文儒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617-4024-7

I. 朱... II. 朱... III. 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国际学术学会-文集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046 号

《朱子全书》与朱子学

——2003 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 编 朱杰人 严文儒
责任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62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2 500
书 号 ISBN 7-5617-4024-7/K·242
定 价 1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朱主人

2003年，是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十周年，恰巧，也是《朱子全书》正式出版一周年。支持并资助编修《朱子全书》，是世界朱氏联合会诞生不久就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决定。正是由于联合会的支持，《朱子全书》才得以历经十年而编修成功。为了纪念这个十周年和这个一周年，华东师范大学朱熹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安徽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和世界朱氏联合会联合于2003年11月在武夷山举行了题为“《朱子全书》与朱子学”的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其中还有两位来自美国的教授。

《朱子全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这固然是因为它的出版终于结束了一个文化伟人死后几百年却始终没有一部可以与他的学术地位相称的“全集”面世的尴尬局面，填补了七百多年来一个巨大的学术和出版空白，而更重的原因是，它的出版，为朱子学和其他学科如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

代开始发端的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朱子与朱子学研究热,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对朱子的研究和认识,必须要打破学科的界限,而跨学科的研究和整合是把现有研究的水准推向更高层次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朱子学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领域,如自然哲学的研究、文献学的研究、宗教学研究等也亟待着有新的突破。而这一切,都期待着一部具有可靠文献价值的“全集”的诞生。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朱子全书》基本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它受到了学界的欢迎,这是对我们十年辛劳最好的回报。

我说“《朱子全书》基本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全部满足,是因为我们的另一项工程——《朱子全书外编》——还没有完成。《朱子全书》可以说已经把朱子自己(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一网打尽”了。但是,朱子还做过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整理和出版前人的著作。如,它为自己的父亲整理了《韦斋集》,他编辑整理了二程的《二程遗书》等。这些著作,虽不是朱子亲作亲撰,但却是经过他一字一句、一篇一篇研究和整理过的,多多少少反映了朱子的思想和学术取向,同样是研究朱子不可或缺的资料。只有把《全书》和《外编》全部奉献在读者面前,我们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个全面的没有一点缺失的朱子。我们才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朱子著作的最全、最权威的文本。我们才可以说,这是前无古人了。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朱子全书外编》的整理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我们正在做后期的制作,不出意外的话,这部书,可以在2005年问世。在这本论文集中,我把《朱子全书外编》的前言和《书斋集》的点校说明予以发表,就是为了提供这样一个信息:《朱子全书外编》已经编好了。

从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专家们提供的论文看,《朱子全书》出

版才一年,却已经进入了研究者们视野。细读论文,可以发现本次研讨的一大特点:从文献出发的研究及与文献结合的研究。前者是一种从文献学出发的研究,后者则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之所以可能,当然和有了便于使用的文献有关。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田浩先生是一位享有很高国际声望的朱子学研究者,他提交的论文是《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他敏锐的目光一下子就抓住了发生在2003年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余英时先生的大作。田浩先生告诉我们:“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期间,我曾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谈,深感这项研究使他充满快乐和兴奋。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挑战性,从而格外重视这项研究,远超朱熹研究中一般所常有的重视程度。”可见,在余先生的心目中,自己的这一著作何等重要!田浩先生的论文,对余著中的两个术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他认为这是一部“朱熹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他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研究朱熹的著作(无论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能够超过这部集精细考证与启人深思的洞见于一体的专著。”这恐怕已经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至高评价了,但只要读过余著,大约都不会不同意田先生的论断。可惜的是,我们的研讨会在余著发表后不久,田先生还来不及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来。不过能在第一时间就朱子学研究中发生的一件大事迅速做出反应,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们期待着田浩先生的力作。

2003年还有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韩国学者金永植的《朱熹的自然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永植,汉城国立大学教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部主任。1973年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8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科学

史博士学位。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近年来,朱子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对朱子自然哲学的研究也由冷趋热。国内也有学者尝试着作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朱子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同样处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前列。他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自然哲学的内涵,这是人们以前所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之所以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太伟大而掩盖了他在另一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个如朱子一样既有社会科学的才能又有高超自然科学造诣的通才。搞自然科学的人一般不懂自然科学,而通自然科学的又不懂社会科学。于是,我们无法把朱子的两端打通。金永植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理学博士和科学哲学博士的双重背景使他有可能游刃有余地驾驭着社会哲学与自然哲学的两端。

2000年11月,在台北举行的纪念朱子逝世8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金先生。他提交的论文即是《朱熹的自然哲学》。这是所有与会论文中唯一的一篇有关朱子自然哲学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听了金先生的报告,深为他文理兼蓄的学养和鞭辟入里分析所倾倒,当时就产生了把他的论文引入国内的念头。可是他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要找一个文理兼通又有很高古文修养的译者谈何容易?幸亏华东师大有一位潘文国教授,他很地道的把这本“天书”翻译了过来。

2004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又出了一本《朱熹的终极关怀》。作者赵峰是一位新人,前后受教于钱逊、孔繁、余敦康诸先生。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从一个看似赶时髦的命题入手,探讨了朱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哲学使命:“就朱熹而言,终极关怀不仅仅是一个不需要做特别事情的纯粹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如

冯友兰先生所说),而且是一个必须有特别行动的道德生命内在的源源不绝不可遏止的终极力量源泉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普泛的一般的道德力量的终极源头的问题(如牟中三先生所说),更是一个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儒家式担当天下的生命行为的终极力量源头的问题。”(见原著“提要”)陈来先生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他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我读了以后觉得这是一篇下过切实功夫的好书稿,不同于现在的一些论文,或炒冷饭,或泛泛而论,所以决定予以出版。

最后,我要对本论文集的所有作者和对本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说一声道歉,由于我的原因,这本书的出版拖了很长的时间,它本应该在 2004 年面市,而现在已经是 2005 年的元月了。

目 录

1	朱杰人	前言
1	蔡方鹿	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6	何俊	朱熹早期知识文本建设与儒学建构
39	郭齐	朱熹的中庸境界
62	刘永翔	朱子诗文略论
67	严佐之	乾淳间朱吕往复信札的文学解读和历史解读
84	戴扬本	朱熹议禅三题
89	潘立勇	朱熹的山水美学思想
107	曾抗美	朱熹与博物学
117	马镛	朱熹“变化气质”论及其素质教育内涵
129	黄珅	戴朱异同论
155	王国良	孔孟·朱熹·戴震 ——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168	李先耕	戴震、朱熹对孟子性善论的疏证
176	吕友仁 顾飞	论朱子《论语集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关系
185	徐仪明	论程朱心理思想与《内经》之关系
197	闵正国 金绍菊	浅论朱陆白鹿洞之会

- 208 田 浩(Hoyt Tillman)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 219 朱杰人 《朱子全书外编》前言
- 222 王贻梁 宋嘉定本《仪礼经传通解》刻工名录
——兼呼吁重视对刻工的系统记录与深入研究
- 241 严文儒 《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刻本考详
- 250 顾宏义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未注出处之引书试析
- 262 朱杰人 《韦斋集》点校说明
- 266 徐德明 朱熹刻书考略
- 276 杨国荣 中国哲学中的名言问题
- 291 方笑一 北宋“新学”名义考论
- 301 朱幼文 耶稣会士与宋明理学
- 321 麦群忠 王阳明在广西
杜朝由

朱熹经学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

慕方鹿

朱熹经学不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主要之处在于:朱熹以注经的形式发展了中国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以义理解经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经学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朱熹以注经的形式发展了中国哲学

经学与哲学相结合,以注经的形式发展了中国哲学,这是朱熹经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体现了朱熹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以前的传统儒家思想包括儒家经学,哲学思辨性欠缺,

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 1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儒家思想学说主要以伦理政治思想为主,而儒家经学则停留在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建立在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依据的佛、道思想相抗衡。与之相应,儒家经学也缺乏哲学思辨的内涵,有待于向哲理性方向提升。朱熹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并融合三教,把儒家思想哲理化,大大提高了中国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以注经的形式发展了中国哲学。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朱熹以说经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重要理论,使得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紧密结合。朱熹提出的本体论哲学范畴有理、道、性、太极等,基本上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注解而提出,并论证了本体的内涵及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天理论是论证的中心,朱熹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并以太极论发展了理本论哲学。二程很少论太极,对太极范畴不予重视,朱熹则通过论述《周易·系辞》之太极说,以阐发其太极论哲学。朱熹把太极等同于天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即为太极,无极则是形容太极的无形状而言,“无极而太极”即指无形而有理,把宇宙本体之理提高到天下“极至”的高度。并由太极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万物”,^①即由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推导出宇宙生成、万物演化的模式。将此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传》之太极说统一起来,认为太极之理为一,发见万物则有详略,最终是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是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通过注解《周易》,为儒家思想哲理化所作出的努力。

在心性哲学方面,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孟子》、《中庸》等的注解和论述,丰富并完善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发展

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心性之学是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朱熹一方面一定程度地借鉴佛教哲学心性论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又在对先秦儒家经典的注解中,注意吸取其心性论思想,并结合时代的发展予以创新,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论,使之更富于哲学思辨性,这是通过注解《孟子》、《中庸》等经典而展开论证的。朱熹指出《孟子》的纲领为:

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则统性情、该动静而为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盖谓此也。今直以性为本体而心为之用,则情为无所用者,而心亦偏于动矣。且性之为体,正以仁义礼智之未发者而言,不但为视听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则吾之所谓性者,彼佛氏固未尝得窥其仿佛,而何足以乱吾之真哉?^②

这是朱熹对“心统性情”论的总的概括,以此与佛教不讲仁义礼智的佛性论区别开。朱熹还通过注解《中庸》来论述其心性论的道心人心说,指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③认为道心以义理为内容,原于性命之正,道心至善;人心以耳目之欲为内容,生于形气之私,人心有善有恶。虽然人心与道心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关键在于要以道心为主,以道心管辖、统御人心,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这是因为道心代表了善的原则,人心虽可为善,亦可为恶,如不加节制,则危而易陷。朱熹又在对《孟子·告子》的注解中提出“性即天理,未有不善”^④的思想,强调“性即理”,援天理以论心性,以儒家心性伦理为本位,将心性哲理与心性伦理相结

合,吸取佛教哲学的本体论形式,把代表儒家伦理的性提升为宇宙本体。又吸取荀子重主体认知功能的思想,强调发挥主体认知之心的能动性,以把握和控制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朱熹在对儒家经典作注解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以“心统性情”思想为纲领和核心的心性理论,从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

在哲学认识论方面,朱熹通过注解《大学》等经典,阐发自己的格物致知论和知行说,达到了当时认识论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哲学认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朱熹为了从《大学》中阐发格物致知的道理,发挥独立思考精神,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以之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补传》尽管不长,但却意义深远,概括了朱熹哲学认识论的要点。朱熹所增补的文字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⑤

在格物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一是强调主客体的区分与对立,二是指出二者具有统一性,相互联系,其中格物是致知的手段和前提,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归宿。朱熹重视在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辨,注意区分认知主体与认识对象,并以主宾来加以界定,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心之知,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认识的对象则是事物之理,理离不开事物,故以事物为人心之知的客体和对象。朱熹进一步明确指出:“知者,吾心之知;理者,

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⑥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所谓宾,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其吾心之知既为主,亦为内;其事物之理既为宾,亦须通过接触外物才能获得,故朱熹的认识论有内外结合的倾向。朱熹还重视格物和致知的相互联系,以穷理作为格物的目的,而即物穷理又是为了致吾之知。要致吾之知,则须即物而穷其理;在即物穷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吾之知。这就是朱熹所说的“致知在格物”。朱熹指出,要将格物穷理进一步提升,使其达到致吾知的阶段,推致其知以至于极后,便可认识万理归于一理的天理,而天理在人心,掌握了天理,便是吾心之知无所不明的标志。可知朱熹的格物穷理与其积累的工夫相应,而致知的极至则是豁然贯通的结果,联系起来,便是物格而知之至。这即是整个认识过程的完成。

以上在哲学本体论、心性哲学和哲学认识论等方面,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把经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以注经的形式发展了中国哲学,改变了传统儒家哲学思辨性欠缺的情形,把儒家经学由以训诂考释为主的阶段,提升到富于哲理性、义理化的阶段。通过注经的形式,创造性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哲学范畴、概念、命题和重要理论,推进了中国哲学与中国经学的持续发展。在对经典的诠释中,发展了中国哲学。

二、朱熹经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朱熹以明人伦、明理为教育的目的。为达此目的,朱熹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要求学者先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然后再看《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

经”。为此，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和《书集传》、《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并授意弟子依据自己的思想作《书集传》等。朱熹的这些解经著作连同“四书”、“六经”本身在当时及后世被作为学校及书院的教材，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朱熹生前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其学术也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但至宋末以后，朱学逐步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将朱学主要是朱熹经学贯彻到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之中，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宋末到元、明、清，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主导地位，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长达 700 年之久，其影响至今犹存。

朱熹的经学思想与其教育思想密不可分，其教育即是以明理为目的的儒家经学教育。朱熹的经学代表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亦是 he 从事教育的主要教材，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不仅是经学史上流传最广的一部经书，而且在中国后期教育史上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教科书。宋末、元、明、清，朱学成为正统思想，通过科举，对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宋末以来，朱熹经学上升为官学，其《四书章句集注》及其他经书著作被列为官学课本，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导。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理宗下诏将朱熹集注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列为学校教育的教材，以体现其“励志讲学”的思想。这是朱熹经学成为官方教育思想的开始。

元统一中国后，朱学逐步得到元统治者的认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制定科举条目，规定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朱注解为主，并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又于延祐二年(1315)正式设科取士，通过科举，把朱熹经学贯彻到教育之中，扩大了朱学的影响。此

后,朱熹的“四书”学成为学子读书、考试的主要内容,并将此定之为“国是”。元代学者虞集称:“朱学及其师友之说,以为国是。非斯言也,罢而黜之。其正乎道统之传,可谓严矣。”^⑦如此,朱熹经学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明清时期,朱熹经学仍被统治者定为官学,得以在教育领域推行。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编纂成以朱学为主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科举以“四书”和“五经”取士。其中“四书”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五经”中《易》用朱熹的《周易本义》及程颐的《易传》,《诗》用朱熹的《诗集传》,《书》用朱熹弟子蔡沈的《书集传》,基本用朱熹之说。使得朱熹经学通过科举的导向,在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代统治者亦大力提倡程朱之学。康熙五十四年(1715),李光地奉敕编纂《性理精义》,以程朱之学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前代一样,科考仍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经学著作,以及其他与程朱之学有关的内容为标准。由此可见朱熹经学在清代教育中的影响。这种情况延续到清末,并未因汉学的兴盛和反对宋学而改变。

从宋末到元、明、清,朱熹经学得到朝廷的提倡而被定为官学,通过科举考试,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朱熹经学不仅在学校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民间私学、书院、蒙学等各种教育也影响甚大。如元代教育家程端礼依据朱熹的思想,编订《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作为家塾教育的内容和程序。其内容包括在八岁以后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朱熹的《孝经刊误》,以及《易》、《书》、《诗》、《礼》、《春秋》并三传等,在十五岁以后则是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此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内容。程端礼的这种教学法,深受朱熹经学思想的影响,并加以系统